

小國的道德經濟

Dr Alexander Ressos, TEP

Attorney-at-Law (Switzerland), Solicitor (Hong Kong),

Solicitor (England & Wales)

控股公司特權自始即飽受爭議。20 世紀 20 年代針對它提出的論點，幾乎預示了下一個世紀對楚格稅收政策的全部批評。這場辯論值得重構，因為它表明，該州是在充分意識到其道德模糊性的情況下作出選擇的。最著名的懷疑者是 Philipp Etter，一位天主教保守派政治家，時任州政府成員，後來成為聯邦委員會成員。Etter 警告說，這部法律將吸引一些帶來“麻煩多於歡樂”的公司。¹他的懷疑來自執政黨內部，表達了一種保守主義的不安：這個信奉天主教的小州將與國際金融糾纏在一起，而國際金融的參與者及其目的對它而言都是陌生的。自由派議員 Albert Meyer 批評控股公司純屬投機。²在左翼方面，社會民主黨人 Heinrich Gallmann 稱這些特權“完全不道德”。³另一位社會民主黨人 Fritz Fischer 譴責他所稱的“有組織的逃稅”，且使用了反猶太主義的言辭，而這並未招致任何後果。⁴

這些批評來自該州全部三個政治陣營，因而呈現出三種形式。保守派的批評擔憂與國際資本結合所帶來的道德和政治後果：該州喪失其身份認同、獨立性和聲譽。自由派的批評懷疑那些不帶來任何實際業務活動的公司的經濟價值。社會主義者的批評則抨擊這一制度的不公正：它允許資本所有者逃避納稅，而工人和農民卻要繳納自己的份額。其中一篇社會主義者發言中的反猶太主義

小國的道德經濟

暗流提醒我們，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關於國際資本的辯論常常受到偏見的毒害，對避稅天堂的批評也並非總能擺脫此類怨恨。

特權的捍衛者提出了一個務實的、著眼於財政的論點。州需要收入。控股公司幾乎不需要公共服務，因此幾乎無需付出成本即可帶來收入。如果楚格不提供優惠條件，其他州就會這樣做，把這些公司吸引過去。既然無法改變國際資本的行為，州所能決定的只是是否從中受益。這一論點在此後每一場辯論中都反覆出現，其基礎是將小國視為競爭環境中的價格接受者——一個無法塑造遊戲規則、只能善加利用規則的政治體。

關於日內瓦的那一卷描述了加爾文主義的信貸道德經濟：財富是一種託管，富人須為此向上帝和社群負責。楚格的歷史中是否存在類似的道德經濟？20 世紀 20 年代的辯論所提示的答案是：楚格稅收政策的道德經濟，就是小國的道德經濟。它包含三個要素。第一是社群生存的優先性：一個財政拮据的小州，在危機時期，必須確保獲得供養其公民所需的收入，並可為此目的行使其主權。第二是接受世界的本來面目：州承認自己無法塑造國際資本的行為，並主張在法律範圍內從中受益的權利。第三是一種分寸感：從 Etter 開始，該州的領導人就意識到與國際資本結合給州的聲譽帶來的風險，這也是為什麼楚格稅收政策的歷史同時也是一部努力管控這些風險的歷史。在僱傭兵服役時代，同樣的三個要素也塑造了該州對外國年金的應對方式。這種驚人的連續性表明，20 世紀的稅收轉向是一種古老策略的新形式。

1 註釋

1. zentralplus, “So wurde Zug vor 100 Jahren zum Steuerparadies” : 天主教保守派政治家、後來的聯邦委員 Philipp Etter 警告說，這部法律將吸引帶來 “mehr Sorge als Freude”（麻煩多於歡樂）的

公司；Zug in der Welt， “Zug mit Steuern steuern”：天主教保守派州政府委員 Philipp Etter 對意外後果表示了保留意見。

2. Zug in der Welt， “Zug mit Steuern steuern”：自由派議員 Albert Meyer（1884–1950）批評控股公司純屬投機。
3. Zug in der Welt， “Zug mit Steuern steuern”：社會民主黨人 Heinrich Gallmann 稱這些特權 “ganz unmoralisch”（完全不道德）。
4. zentralplus， “So wurde Zug vor 100 Jahren zum Steuerparadies”：社會民主黨人 Fritz Fischer 以反猶太主義的言辭譴責 “organisierte Steuerflucht”（有組織的逃稅），而這並未招致任何後果。

僅供一般參考。本文不構成法律或稅務意見，不能取代針對個別情況的專業意見，亦不建立律師與客戶關係。本文反映截至2026年9月的法律狀況。

網上版本：hk.helveticaregister.com/zug-a-moral-economy-of-the-small-state